

古代社会与政治

——周代的政体及其变迁

谢乃和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谢乃和著

——周代的政体及其变迁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代社会与政治:周代的政体及其变迁/谢乃和著。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1.4
ISBN 978 - 7 - 207 - 08984 - 7

I. ①古… II. ①谢… III. ①政治制度—研究—中国
—先秦时代 IV. ①D69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71082 号

责任编辑: 孙国志

装帧设计: 李 梅

古代社会与政治

——周代的政体及其变迁

谢乃和 著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
邮 编 150008
网 址 www.longpress.com
电子邮箱 hljrmcbs@yeah.net
印 刷 黑龙江远东联达教育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1.5
字 数 33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07 - 08984 - 7
定 价 40.00 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制质量问题,印刷厂负责调换)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哈尔滨分所律师赵学利、赵景波

本书由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09YJA770006）项目
东北师大“西汉帝制建构、思想融合与文学演进”团队项目

资助出版





序 一

谢乃和博士的第一部学术专著《古代社会与政治——周代的政体及其变迁》即将付梓，作者邀我在卷首写几句话，承其盛意，一则表达我的庆贺之情，同时又能先睹为快，借此谈几点感想。我作为年长者，也是一次向年青学者学习、激活自己思维的机会，免得思想僵化。

本书的选题是“古代社会与政治”，这是很宏观的视野。作者立足于中国古代早期国家阶段的社会与政治关系，烘托出当时的政治特质，全景式地展现其社会面貌；同时作者又以“周代的政体及其变迁”为副标题，证明本书是以此为核心，聚焦式透视影响古代社会与政治关系的关键点，使当时社会的政权机构、国家结构及相关政制建构的理论基石等问题凸显出来，从而具体解决古代社会与政治的关系。这是一项颇令人感到余味无穷的很有学术价值的选题。

要展示“古代社会与政治”这项课题，首先要从理论上解决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形成道路问题。对此，本书作者在细绎具体历史实际的基础上有明确地论述。他与许多学者有相似观点，认为：与西方古典世界不同，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形成是在原有氏族制度基础上产生父权大家族及其父家长制特权过程中实现的。国家的形成不是建立在氏族制的废墟上，而是建立在对氏族制的继承和改造上。国家形成不是纯粹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而是既有地域性，又有血缘性，地方基层存在着大量家族、宗族、氏族、部族组织。本书作者基于这一认识出发，对夏商周三代，特别是周代政体中的政权组织和国家结构相关的管理制度等诸多问题的解决才可迎刃而解。

本书的另一鲜明特色是作者不像以前许多研究者传统地从经济因



素来分析早期国家的社会与政治，而是另辟蹊径，从另一个角度，即非经济因素，“从古代政治、社会与思想三个维度，以个案专题研究的形式”，对周代政体进行多视角探讨，进而具体考察古代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及其演变。本书从“三个维度”逐一动态地进行分析。其一，从职官制度上分析，具体地探讨了古代封建体制下的等级臣僚（天子之王臣、诸侯之公臣、卿大夫之家臣、士之私臣）向集权体制下官僚制之间的演变，展示出当时政权结构的分散性、层级性以及家国同构的特点。

其二，从社会制度上分析。作为古代的性别分工、婚制和姓氏制对古代中国政制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表现为王与后分治、女性地位的变化以及宗法制维系下的宗统与君统的一致等，都反映出古代中国社会政治演进的独特道路。

其三，从古代思维方式来分析。是以三个案例分别来揭示，即从《山海经》所反映的初民思维、“华夷之辨”的缘起以及周代德治思想的渊源等问题谈起，展示出古代中国社会政治的生动斑斓全貌。

在研究方法上，作者对传世文献进行了认真细致地整理，尤其在“三礼”、《春秋》经传等古代典籍的注释笺疏剖析考证上颇下一番功夫。在运用“二重证据法”方面，作者大量使用相关的甲骨、金文、盟书、简牍等出土资料，对其反映出的相关政制情况都不遗余力地加以论证。值得称道的是，作者不仅关注宏观上理论体系的把握，而且特别注意个案研究，如“宰”“相”“宰相”的分析研究则是细致入微，笔笔有宗，令人信服。

从乃和博士的经历、学历来看，他能吸取各路学者之所长，刻苦勤奋，朴实无华，利用优良的学术传统和环境，抓住机遇，锲而不舍，努力探索，终于做出了这份可喜的成果。我有幸，在他六年前入东师史苑后，我与他建立了亦师亦友的关系，我们能常在一起切磋学问，坐而论道，互为补充。我从年青人身上得到了滋养，使自己在学术生命道路上也年轻了许多，这也是我步入“暮年”时遇到乃和博士而增添了的一份福气。

詹子慶

2011年7月12日



序二

社会形态的研究历久而弥新，古代多遵循“三皇五帝到如今”的王朝序列说，实际上是王朝更迭的历史。西学东渐以后，学者开始关注古代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事。至今仍占据主导地位的历史阐述模式逐渐形成。打破王朝体系、注重社会经济基础的发展，这固然是史学研究的进步，但同时似乎也多少屏蔽了关注政体与政治发展的视野，好像诠释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就是史学研究之大成。

其实，在古代社会形态中，政体与政治占据了社会历史舞台中央的位置，成为社会发展的枢轴和标识。夏商周三代政体与政治同秦以降的封建王朝有着很大的不同，但后者又是从前者发展变迁而来的，所以说研究古代社会形态，三代政体问题正是其中的重要部分。夏商周三代社会政治绝非两大对立的阶级阵营的划分。这一点，春秋时人还能够讲得清楚。《左传·昭公七年》记载这样一个著名的故事。春秋后期，楚国担任芋尹之职的大夫无宇，其家臣逃亡到楚灵王的章华宫里，无宇到宫里抓人，反被管理章华宫的官员抓了起来，送交楚灵王处理。结果楚灵王听了无宇讲的一派话之后，不仅将其释放，而且允许无宇带走其逃亡的家臣。无宇说了些什么话，让赫赫楚王折服了呢？请看他的这段话语：

无宇辞曰：“天子经略，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故《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



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执人于王宫?’将焉执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阅。’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作仆区之法曰：‘盗所隐器，与盗同罪。’所以封汝也。若从有司，是无所执逃臣也。逃而舍之，是无陪台也。王事无乃阙乎？昔武王数纣之罪，以告诸侯曰：‘纣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故夫致死焉。君王始求诸侯而则纣，无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盗有所在矣。”

楚灵王听了这番话，对于无宇加给他的“与盗同罪”一点也不烦恼，还说：“取而臣以往。盗有宠，未可得也。”他竟然以“盗”自居，表现出对无宇相当和善的态度。楚灵王所折服的是古代政体的基本原则，实行了这个原则，王位才会巩固，王权才能够得以实现。无宇所说的这种层层相叠加的社会阶层面貌，完全不是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两大对立阵营的情况，而是周代分封制度下所形成的社会形态。要认识古代社会，就必须了解和研究这种社会形态，特别是要研究王朝政治权力中心的面貌及其运作特色。谢乃和同志的这部大作，愚以为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就在于把这方面的研究加以系统化并且向前推进了一步。

谢乃和同志是幸运的。他先得葛志毅先生的教诲，打下了深入而厚实的学术基础，在他走上工作岗位以后，又得詹子庆先生多方教育和帮助，使得研究水平进一步提高。在多年的学习和研究工作中，他总是以孜孜不倦的努力钻研而赢得广泛赞誉。这本书是他的精心之作，也是他将阶段性成果向学术前辈的汇报。相信他一定会做出更大的成绩，迎接学术春天的来临。

谨序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2011年2月2日



序 三

社会学术文化的发达，首应注意学风道德及研究方法的探讨。因为对于人文学者而言，此乃关乎其学术修养及人格操持大节，从而影响及于一世学术风气之形成培养，切切不可轻忽怠惰。对此，我有些微末之想，亟欲拈出求教于同道，下试述之。

一、要学会尊重理解古人，克服今人高明于古人之妄想。受西方影响，人们习惯于从片面进化论的观点评判历史，于是我们今日好似立于历史最高点俯视古人，从而有我们比古人高明之想。且不说古代先民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所取得的生存发展硕果，足以证明他们就是其时最大的成功者；即便从一般的发展进化观点看，古人积累的文化不仅是今日社会发展的起点，而且是今日必须参照挹取的珍贵历史资源。故从此意义上讲，如无古人则必无今日世界，那么绝不可轻议古人，更无权贬谪灭弃古人。有学者指出，是钱大昕概括提出“实事求是，护惜古人”的传统文化研究原则。^① 又有学者指出：

先哲有言：读书当与古人相较，当自以为愚。近代以来中国学术的弊端之一，或为学人往往自以为智，因而天才想象和文人气质难受真理与逻辑的控制。守成尚且力所不逮，却竞相推陈出新，结果陈义纵高，……误人害世。^②

① 朱维铮：《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30页。

② 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6页。



所谓“天才想象与文人气质”往往难成学者气象，麻烦每由此生，而世人则多难洞明。今世之人或动辄訾议诟詈古人，借以博取高世大名，但古代学者多不敢轻为此举，近代以来却莫此为甚，此中原因，发人深省。语云：“不薄今人爱古人。”论学应当宽宏雅量，有容人之度，切不可傲视古今，睥睨一世。如有学者自以为识得西洋学术新义，谓章太炎“在文字学以外是个文人”，其所作《文始》“一步倒退过孙诒让，再步倒退过吴大澂，三步倒退过阮元”；《新方言》“东西南北的猜去，何尝寻杨雄就一字因地变异作观察？这么竟倒退过两千年了”。^① 章太炎真可如此一切骂倒吗？似如此肆口无忌，有失学者宽宏求是雅量。钱大昕有曰：

愚以为学问乃千秋事，订讹规过，非以訾毁前人，实以嘉惠后学。但议论须平允，词气须谦和，一事之失，无妨全体之善，不可效宋儒所云“一有差失，则余无足观”耳。……千虑容有一失，后人或因其言而信之，其贻累于古人者不少。去其一非，成其百是，古人可作，当乐有诤友，不乐有佞臣也。^②

钱氏以此劝喻王西庄，已传为学林嘉言。这里指出学术批评之必要性，但一要实事求是，二须词旨宽厚，三当护惜前人。切忌率意妄诋而无当，反自成其妄。学风道德关乎世风之美恶薄厚，故跻身学林，务应以谦和谨敬躬自检束。不可妄贬古人，为尊重传统；不可轻诋今人，以淳厚世风。总之，二十世纪以来激烈反传统的遗害，至今犹当引以为鉴。

二、应学会从历史出发去研究历史，而不是先入为主，即从现实发现问题，然后反观历史去探寻答案，以作为自己现实推断的佐证根据，其下者乃以己意和想象为据伪造模塑历史。似此都缺乏史学研究自身的实事求是之意。从学术立场上讲，因研究历史的目的不同，决定了研究历史的方法各异，但无论如何，都必须尊重历史。其实若从纯粹的史

^① 岳玉玺等编选：《傅斯年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76页。

^② 钱大昕：《潜研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636页。



学研究层面讲，研究历史的主要目的，是要透过历史活动的表象，深入探究古人在思考什么以及如何思考，如此方可认识古人行为的真实内在原因，从而对历史作出正确如实的解释评价，亦即真正认识了历史。因此务必要先读书，培养起对历史的基本感知理解，然后由此出发再去研究历史，求索真相，则可达“虽不是，然究亦不远之境”。有学者指出：

近代国际汉学的方法，虽然轨则不一，基本倾向是重在发现，可概言之为找材料。中国传统治学则首重发明，先读完书以求贯通，才能不失之于偏蔽，因而责通人而不重专家。

他把王国维与胡适的方法作了区别比较：

前者主张读书，后者实为找材料。王国维以为，“宜由细心苦读以发现问题，不宜悬问题以觅材料”，这不仅是批评疑古派，也针对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胡适科学主义。因为“胡先生想把国学开出一细账来，好像是索引，一索即得。但是细账开好后，大家便利了，也就不读书了。”萧公权也主张在假设与求证之前，应有一放眼看书的阶段，以免“思而不学则殆”。胡适与顾颉刚等人往往在立论之后才大量补充材料，虽因悟性高而不至于大谬，毕竟有先入为主之嫌。^①

尽管论者的批评有所保留而显得婉转，但其所言颇有是处，且我亦有同感。如我曾指出过引得式或曰索引式治学方式的弊端：

即它在方便检索的同时，也有助长不良学风的倾向。这里举一最简单的例子，如研究西汉的社会历史，至少要熟读《史记》与

^① 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6~8 页。



《汉书》两部基本史籍。因为这是当时或稍后的学者，根据亲身闻见的史料撰作而成，因而它们是认识西汉社会历史生活的百科全书。诸如当时曾面临哪些社会历史问题，其中哪些问题得到解决，或解决到什么程度；哪些问题没有解决，或者是如何被搁置起来了。又如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如何，什么构成当时社会的思想评价体系，等等。这些在《史记》、《汉书》中都有反映。只有把这些问题搞清，学者才有可能在较为完整的知识背景下去研究西汉社会，同时这也是确保原创性研究成果的基本条件。为此，首先必须对《史记》、《汉书》等基本史料通读考察，建立起对西汉社会历史的整体概略认识，获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要基础。现在有人则不然，并没有通读彻悟《史记》、《汉书》等史籍，仅凭对西汉社会历史的片断了解，便贸然依据引得查寻《史记》、《汉书》中相关概念字句，再以其在现代生活经验中培养起的思想观念为依据，经拼凑整合，牵引成文，如此去论述阐发西汉的社会历史。这样的研究在多大程度上符合西汉社会历史的实际，实在令人怀疑。^①

即首先必须读历史，培养对历史的体会感知觉悟，使身心融入历史的境界之内，能与古人精神相通，然后才能谈得上研究历史。按如此要求，培养一个真正的历史学者，绝非易事。

三、我们研究历史，首先必须树立一种如钱穆所云“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同时要拒斥所谓事实“中立性”原则。所谓事实“中立性”原则，指在科学的研究和理论活动中，人应该保持中立，尽量减少乃至排除自己的主观因素，诸如兴趣、爱好、价值观等的渗入，倡导“客观主义”的研究方法与态度。西方的法兰克福学派指出，坚持事实“中立性”原则，乃是科学主义（主要指实证主义）重物轻人的表现之一，并对其持批评态度。他们指出，它实质上割裂了事实与价值、客体与主体、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排斥理论活动与科学研究中心人的主体地

^① 葛志毅：《谭史斋论稿续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页。



位和能动性,其极乃有在科学活动中不应该谈论主体的主张。^①这种事实“中立性”原则不应存在于人文学科的研究之中,但它在中国却随着科学主义的影响而长期存在。胡适与傅斯年都提倡科学,所以实质上都主张以事实“中立性”原则研究史学,这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及《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都有显然的反映。傅斯年认为,研究史学只是整理材料,“反对疏通”,“材料之内使他发见无遗,材料之外我们一点也不越过去说。”^②这是服膺事实“中立性”原则最典型之例。若论其是非,实较为复杂,它涉及具体研究方法与人文学科特殊性所决定的人文学者应持的学术观念之间的差异性问题。梁启超认为清代高邮王氏父子治学方法有科学精神,并归纳出六点,其“第二曰虚己”,即考证家应避免“以一时主观的感想,轻下判断”,而应“先空明其心,绝不许有一毫先入之见存,惟取客观的资料,为极忠实的研究。”^③如梁氏所言,为研究结论的可信,我们必须保证客观求实、求是的态度,就是说,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不能存有丝毫的主观臆想、武断曲解之处,坚持实事求是、无征不信、崇实黜虚的客观态度及方法。但是,作为一个研究中国文化的人文学者,在总体上所应持的学术观念,则与此有所不同。因为我们研究中国文化,就是为发掘中华文化之精粹,宏扬中国的民族文化精神,提高国民的民族文化意识。所以首先必须树立起对中国文化的尊崇与敬意,这是最为重要的,同时是人文学科之特殊性所决定的,也是五四直至文革的历史所提供给人们的启发借鉴。

这里可举三皇概念作为例证,说明我们对中国文化所应持的态度。三皇五帝史统是中华先民积累起的民族文化信念所在,是中华民族的生存意识根基,它是对民族自身及宇宙世界本源的解释体系,其中包含特定的价值内涵。无论是从研究或者理解的角度,都不能像对一般的科学概念那样看待三皇概念。三皇是以天地人三才作为其原型,即认为天生之、地养之、圣人治之是宇宙结构形成的基本原理。《新语·道基》曰:

^① 李瑜青:《人本思潮与中国文化》,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187页。

^② 岳玉玺等编选:《傅斯年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80~181页。

^③ 梁启超:《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53页。



传曰：“天生万物，以地养之，圣人成之。”功德参合，而道术生焉。

按“传曰”表明它是一个前有所承的久远思想观念，先秦古书可以证明此点。其意谓天地形成过程中伴随着万物化生及宇宙之形塑，于是有圣人首出御世，施教化治理之功成就之。《汉书·律历志》之《世经》则说为“炮牺继天而王，为百王先”。此乃为入手理解中国古代人文历史所应具的基本意识。以此为基本原理，引申发展出先民认识宇宙世界的道术体系，并结晶为历代相承的经史传统。这其中又有历代圣贤的生命体悟，包括他们的智慧感知所融通的硕果。对于这样一个由智性觉悟积累起的经验性知识体系，我们必须理解它，尊重它，但是不可能用自然科学一样的科学方法分析研究它，那样得出的结论必然是其不可信，此正乃五四以来疑古派失误之症结所在。这样一套由智性觉悟融通起来的经史道术体系，复由历代圣贤的经纬翼赞，已成为中华民族的生命信念之元。若用怀疑的方法使之分析解体，就相当于摧毁夷灭中华民族生存立世的生命信念根基，没有比这个作法更鲁莽不合宜了。这就是我一向反对作为人文学科之一的史学科学化的原因之所在。^①

乃和曾从我读硕士，聪敏好学，后入晁福林教授门下读博士，经多年努力已学有所成。因其近年的研究成果《古代社会与政治——周代的政体及其变迁》这部力著即将出版面世，索序于我，余因赘述如上以为喤引，兼存与乃和讨论之意云耳。

葛志毅

2011年2月12日序于大连

^① 参葛志毅《历史真谛在其人文内涵而在其是否是科学》，载《谭史斋论稿四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目 录

序一	詹子庆(1)
序二	晁福林(1)
序三	葛志毅(1)
绪言	(1)
第一章 古代文献与上古等级臣僚体制	(8)
第一节 《仪礼》所见周代等级臣僚形态	(8)
一、天子之王臣	(9)
二、诸侯之公臣	(10)
三、卿大夫之家臣	(22)
四、士之私臣	(27)
五、《仪礼》中职官史料之价值	(32)
第二节 《周礼》“冢宰”与金文所见西周王家之宰	(34)
一、问题的缘起	(34)
二、文献彝铭中的“王家”及其管理者“宰”	(36)
三、金文中作为经济实体的“王家”与宰官的常职	(40)
四、册命金文中的宰官地位：	
兼论王室事务官与王朝政务官的官联	(53)
五、结语	(57)
第三节 古代文献“冢宰”最高辅相说与先秦宰官源流	(58)
一、文献所见冢宰为最高辅相说	(59)
二、殷刻辞彝铭所见宰职及其分化	(62)
三、宰职演变之一：周代贵族家务总管及其常职	(67)



四、宰职演变之二：殷周冢宰摄政	(72)
五、冢宰制国用与周代祀典制度	(77)
六、周公以后的冢宰与太宰	(85)
七、结语	(95)
第二章 古代家臣与上古官僚体制	(97)
第一节 春秋时期晋国的家臣制度	(97)
一、春秋时期晋国私家政权化	(98)
二、春秋时期晋国家臣的层级结构	(101)
三、春秋时期晋国家臣的仕进	(106)
四、春秋时期晋国家臣的管理	(110)
五、春秋时期晋国家臣制的演变	(115)
第二节 春秋时期齐国的家臣制度	(118)
一、私朝与陪臣：齐国私家职官的制度化	(118)
二、春秋时期齐国私家之职官体系	(121)
三、春秋时期齐国私臣的选拔	(126)
四、春秋时期齐国私臣的管理	(129)
五、结语	(131)
第三节 春秋时期鲁国的家臣制度	(132)
一、春秋时期鲁国私家之朝	(132)
二、春秋时期鲁国私家职官的系统	(134)
三、春秋时期鲁国私家职官的仕进	(140)
四、春秋时期鲁国私家职官的管理	(145)
五、结语	(149)
第四节 春秋家臣屡叛与“陪臣执国命”成因	(150)
一、地位一般家臣掌政而叛乱	(150)
二、邑宰之叛	(152)
三、陪臣执国命：阳虎专鲁政	(155)
四、春秋后期家臣叛乱特点及其原因	(157)
五、结语	(162)
第五节 古代家臣与先秦宰相制度的起源	(163)



一、宰相起始诸说	(164)
二、春秋以前的相及其演变	(166)
三、相与战国时宰相制度	(171)
四、家宰、相室与宰相、相国： 从称谓的演变看宰相制度的起源	(172)
五、结语	(177)
第三章 古代性别与上古政权组织	(179)
第一节 金文中所见西周王后的事迹	(179)
一、传世文献所见西周后妃的形象	(180)
二、文王后太姒的事迹	(182)
三、武王后邑姜的事迹	(183)
四、成王后王姒的事迹	(183)
五、康王后王姜的事迹	(185)
六、昭王后的事迹	(192)
七、穆王后的事迹	(194)
八、恭王以后西周王后的事迹	(197)
九、结语	(200)
第二节 西周官制中的王与后分治制度	(201)
一、礼书所见周代性别分治政权组织	(202)
二、周代可信典籍所载的性别分治政权组织	(205)
三、出土文献记录的王与后分治制度	(209)
四、结语	(213)
第三节 殷周时期贵族妇女角色之演变	(213)
一、文献卜辞所见殷商时期贵族妇女与政事迹	(213)
二、殷周鼎革与周代礼制下贵族妇女角色	(217)
三、宗周覆灭与东周性别角色理论的总结	(221)
第四节 古代性别政治与先秦女祸观的起源	(224)
一、文献所见古代妇女的归属地位	(224)
二、文献所见古代妇女的获致地位	(227)
三、三代亡于女色与女祸观念的产生	(231)